

О рабстве и свободе  
человека

Опыт перс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俄] 别尔嘉耶夫 著

张百春 译

---

О рабстве и свободе  
человека

Опыт перс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俄] 别尔嘉耶夫 著

张百春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俄罗斯)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662-3

I.①论… II.①别… ②张… III.①人格主义-研究 IV.①B8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4268 号

责任编辑 毛衍沁

封面设计 周伟伟

##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俄]别尔嘉耶夫 著

张百春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25  
插页 4  
字数 192,000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662-3/B·1381  
定价 68.00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的作者是 20 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人生经历充满着坎坷与传奇。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1 年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贵族家庭。1894 年，别尔嘉耶夫考入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学系，一年之后，转入法律学系。正如其在本书自序中所言，他从小深受托尔斯泰影响，托尔斯泰反抗虚伪社会关系的斗争精神，渗透进了他的身心。他自言：“即使现在，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路后，我还能从自己身上辨认出这些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原初评价，能辨认出这种自由，即我摆脱了强迫性的社会传统，摆脱了思想健全的人的那些道德偏见，还能辨认出对暴力、‘右派’和‘左派’的反感。我把这看作是我身上精神的革命性，它可以产生对周围世界的各种反应。”这一革命性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1898 年，别尔嘉耶夫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后被学校开除。

1901年，他被判流放沃洛格达3年。1904年，他来到彼得堡，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1905—1906年，别尔嘉耶夫又同布尔加柯夫一起编辑《生活问题》杂志，力图汇集当时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中的各种新潮流。随后几年，别尔嘉耶夫写就了大量作品：《从永恒的观点出发——哲学的、社会的和文学的经验（1900—1906年）》《新的宗教意识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等。191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宗教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

十月革命之后，别尔嘉耶夫最初抱着巨大的热情，但不久，社会革命的粗糙使他产生幻灭感。1918年，别尔嘉耶夫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各种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1920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推选他为教授。不幸的是，1921年，他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审讯后，被释放。次年夏天，他再度被捕，并被驱逐出境，理由是别尔嘉耶夫“已经不可能转向共产主义信仰”。从此别尔嘉耶夫开始了他后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

流亡到欧洲后，别尔嘉耶夫起初侨居柏林，后又迁至巴黎的郊区，并长期定居于此。他创作的黄金期由此开始。《自由精神哲学》《论人的使命》《自我与客观化世界》《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等一大批著作就产生于这期间。他认为《论人的使命》和《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两书最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基本思想在这两本书中获得了充分的表述。

需要请读者注意的是，别尔嘉耶夫尽管有一段时间在思想上曾亲近过马克思主义，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也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在后期，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背离。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宗教唯心论的影响。他试图把基督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

## 出版说明

来，通过个体与上帝的交会，净化人的心灵，从而达到个体人格的自由。这显然与当时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二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某些思想的异议。正如他在本书自序中所言“我坚信真理和善是作为理想价值而存在的，不依赖于阶级斗争，不依赖于社会环境，即我不同意哲学和伦理学彻底地服从阶级的革命斗争”，“卢那察尔斯基断定，如此保卫无私的真理，保卫理性和个性判断的权利的独立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使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服从革命的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也对我说，坚持我的独立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是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别尔嘉耶夫的这一思想的转折与其个人遭际和身处的大背景密不可分，也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可避免的有一定局限性，至于如何对待和评价本书中的观点，请诸位读者鉴别。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1

如今嘲笑自由成为时髦，人们把自由当作无用的陈腐观念。我不赶时髦，我认为，没有自由，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自由给生命以价值，即使你认为我是自由的最后一名保卫者，我也不会停止为自由的权利而呐喊。

夏多布里昂<sup>①</sup>《墓外回忆录》

---

<sup>①</sup>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译者注

# 代前言

## ——我思想中的矛盾

在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回顾一下过去，于是就有了一个愿望，向自己和他人解释我的思想和精神之路，理解我的思想在时间中表现出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矛盾。本书论述人的奴役与解放问题，就其中的许多部分看，本书属于社会哲学，但它表达了我的完整的哲学世界观。本书的基础是人格主义哲学。这是我对真理漫长的哲学探索的结果，是我为重估价值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在我的哲学生存里，没有仅仅去认识世界的愿望，认识的愿望总是伴随着改造世界的愿望。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我一直否认这个给定的世界是稳定的和终极的实在。本书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我以前著作中所表达的全部思想？思想家思想的发展是在什么意义上进行的？这个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还是其中包含着间断并经历着危机和自我否定？我的思想发展在什么意义上进行，我思想中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一开始就建构



体系，一生忠实于这个体系。还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自己的哲学里所表达的是其精神斗争，在他们的思想里可以分出不同的阶段。在动荡的历史时代，在精神变革的时代，一个哲学家如果不愿意成为书斋式和本本主义的人，那么他就不能不参与精神斗争。我从来不是学院式哲学家，从来也不希望哲学是抽象和远离生活的。我一直都在读书，读了许多书，但我的思想来源不是书本。我总是把所读的书与自己所体验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我甚至从来都不能按照另外的方式理解任何一本书。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哲学永远是斗争。柏拉图、普罗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如此。我的思想一直属于存在主义哲学。在我的思想里可以找到许多矛盾，它们是精神斗争的矛盾，生存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可能用表面的逻辑统一来掩盖。思想的真正统一与个性的统一相关，这是生存的统一，而不是逻辑的统一。生存是矛盾的。个性（личность）是变化中的不变性。<sup>①</sup>这是对个性的实质定义之一。变化发生在同一个主体里。如果一个主体被另外一个主体替代，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如果变化变成了背叛，那么这样的变化将破坏个性。如果一个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的基本主题、思想的主要动机、价值的基本方针发生改变，那么他就是在背叛。精神自由在哪里实现以及怎样实现，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可以有变化的。但是，如果对自由的爱被对奴役和暴力的爱取代，那么，在这里就发生了背叛。观点的改变可能是事实上存在的，但也可能是事实上不存在的，那是由于人们从不正确的视角看待这些观点。我认为，人

---

<sup>①</sup> 我们把 личность 一词翻译为“个性”。尽管通行的译法是将其译为“人格”，而且也更符合“人格主义”（персонализм）一词，但是，личность 一词并不包含“人”意思，它突出的是事物的“单一性”“唯一性”。不过，我们依然按照哲学界通行的译法，把 персонализм 一词翻译为“人格主义”。——译者注

完全是矛盾和极化的存在物（поляризованное существо）。哲学家的思想也是矛盾和极化的，如果他的思想没有完全与原初生命分离，而是与之保持联系。哲学思想是个复杂的东西，甚至在逻辑性极强和最流畅的哲学体系里也可以发现其中矛盾因素并存。这并非坏事，而是好事。思想上彻底的一元论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实现了这样的一元论，那才是件坏事。我很少相信建立哲学体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永远也不可能是终极和完善的。黑格尔哲学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其中思想的进程和辩证法采取了一个完备体系的形式，就是说，辩证的发展似乎被终止了。精神进程以及精神里不断产生的矛盾的消失只能是世界的终结。在世界终结之前，矛盾不可能被消除。所以，思想必然要转向末世论前景。末世论前景给思想以相反的解释，并在世界生活内部引起矛盾和悖论。返诸自身，我想确定我的整个生命和思想的基本主题和价值的定位。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我的思想的内在联系，其中对变化中不变的东西的忠实。我关于社会生活的意见中的基本矛盾与我身上并存的两个因素相关，一个是对个性、自由和创造的贵族式理解，另一个是按照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那样，肯定每一个人、最卑微的人的尊严，保证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这也是我对高尚的世界、对崇高的爱，与我对卑微的世界、对遭受痛苦的世界的怜悯之间的冲突。这个矛盾是永恒的。尼采和托尔斯泰与我同样地接近。我对马克思评价很高，对梅斯特尔和列昂季耶夫的评价也很高。雅·伯麦与我很接近，他是所喜爱的思想家，但康德与我也很接近。如果平均主义的暴虐凌辱我对个性尊严的理解，凌辱我对自由和创造的爱，那么我就起来反抗它，并准备以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当社会不平等的保卫者无耻地维护自己的特权时，当资本主义压迫劳动大众，把人

变成物时，我同样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否定当代世界的基础。

只有转向哲学家对世界的最初感受，转向他对世界的原初认识，才能解释其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内在动因。哲学认识的基础是具体的体验，它不可能依赖于概念的抽象组合、逻辑推理式的思想，这些东西只是工具。自我认识是哲学认识的主要根源之一，当我转向自我认识时，我在自身中发现了原始的和根本的东西：抵制世界的给定性；不接受任何客体性，将其看作是对人的奴役；精神自由与世界的必然性、暴力以及无差别统一的对立。我所说的这些，不是自传中的事实，而是哲学认识和哲学道路上的事实。我的哲学的内在动力一开始就是这样确定的：自由先于存在，精神先于自然，主体先于客体，个性先于普遍—共性，创造先于进化，二元论先于一元论，爱先于法律。承认个性的首要地位就意味着形而上学的不平等、差别，不同意混淆，肯定质而反对量的统治。但是，这个形而上学的质的不平等完全不是指社会和阶级的不平等。不懂得怜悯的自由将成为魔鬼的自由。人不但要上升，而且还要下降。在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和思想的探索之路后，我特别敏锐地意识到，任何人的个性，最卑微的人的个性，在自身中都携带着最高存在的形象，都不可能成为工具，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任何个性在自身中都有一个生存中心，它不但拥有生命的权利，这个权利被当代文明所否定，而且还拥有获得生命的普遍内容的权利。这是福音书上的真理，尽管它没有获得充分的揭示。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在质上不同和不平等的个性不仅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而且在社会面前也是平等的，社会无权依据特权，即依据社会地位的差别来区分个性。在无阶级的社会结构这个方向上，社会平等的含义恰好应该是揭示人

们个性的不平等，揭示他们质上的差别，不是根据社会地位，而是根据实质。于是我走向了反等级人格主义（антиерархический персонализм）。个性不可能是任何等级整体的一部分，它是个处在潜在状态的微观宇宙。于是，在我的意识里结合着两个原则，无论在世界里，还是在我自身，它们都可能处在对抗和斗争之中，这就是个性和自由的原则，怜悯、同情和正义的原则。平等原则自身没有独立意义，它服从个性的自由和尊严。放弃社会传统，放弃贵族社会的偏见和利益（我就出自这个贵族社会），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在自己的探索之路上，我是从自由出发的。同样，俄罗斯知识分子业已形成、定型和僵化的观念和情感从来没有束缚过我。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属于这个知识分子圈子，实际上我不属于任何圈子。此外，我厌恶资产阶级，不喜欢国家，我还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尽管这是特殊类型的无政府主义。不需要以对世界的爱为出发点，而应该以精神自由与世界之间的对立为出发点。但是，从精神自由出发并不意味着从空白出发，从虚无出发。理念世界有精神内容，要理解哲学家的探索之路，必须谈理念世界。首先要谈哲学理念的世界。

如果从柏拉图主义或者黑格尔和谢林哲学的观点出发，那么就不能理解我的哲学世界观的本原，首先无法理解我的核心观念，即与生存和自由对立的客体化观念。柏拉图和普罗提诺，黑格尔和谢林对俄罗斯宗教哲学而言有重大意义。但是我的哲学有另外的根源。从康德和叔本华出发，比从黑格尔和谢林出发更容易理解我的思想。康德和叔本华在我的哲学探索之路的最开始确实具有重大意义。我不是学院派哲学家，不曾属于任何学派，现在亦然。叔本华是我深刻理解的第一位哲学家。我开始阅读哲学著作时还是个小男孩。尽

管年轻时我曾接近康德主义，但从来没有或多或少在整体上赞同康德的哲学，对叔本华的哲学也一样。我甚至同康德进行过斗争。但他们的一些决定性思想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我的整个哲学探索之路上一直存在。康德的二元论，他对自由王国和自然王国的区分，他的具有理性认识特征的自由学说及其唯意志论，他对现象世界的看法，现象世界区别于他不成功地称之为物自体的真正世界，所有这些思想都很合我的意。叔本华对意志和表象的区分，他关于意志在自然界中客体化的学说，这个客体化所建立的不是真正的世界，以及他的非理性主义，都合我的意。下面就是分歧了。康德关闭了认识有别于现象世界的真正生存世界的途径，在他的哲学里几乎完全缺乏精神范畴。叔本华的反人格主义同样与我格格不入，我敌视他的反人格主义。与我完全格格不入的还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一元论、进化论和乐观主义，他们对精神、普遍的“我”、理性在世界和历史过程中的客体化的理解，特别是黑格尔关于精神的自我展开的学说，关于世界过程向自由发展的学说，关于神的形成的学说。康德的二元论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更接近真理。关于纯哲学理念也应该这样说。<sup>①</sup> 更重要的也许是理解，在我对周围社会现实的态度上，在对周围世界的道德评价中，我是从哪里获得原动力的。在青少年时代的最初几年，当我几乎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从托尔斯泰那里获得过非常多的东西，向他学习了许许多多。我很早就有一个信念：文明的基础是谎言，在历史中有原罪，整个周围社会都建立在谎言和不公正的基础上。这个信念就与托尔斯泰有关。我从来也

<sup>①</sup> 即纯哲学理念与作者格格不入。这里“纯哲学理念”的原文是 чисто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деи，意思是纯粹的哲学理念，这里的“纯”是副词，修饰哲学理念。纯粹的哲学理念是指摆脱了任何其他东西（如宗教因素、情感因素等）的哲学理念，即抽象的、与现实无关的哲学理念。——译者注

不是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甚至不太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但托尔斯泰起来反抗历史上的假伟大、假神圣，反抗人们在所有社会关系中的虚伪，这些却渗透了我的整个身心。即使现在，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路后，我还能从自己身上辨认出这些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原初评价，能辨认出这种自由，即我摆脱了强迫性的社会传统，摆脱了思想健全的人的那些道德偏见，还能辨认出对暴力、“右派”和“左派”的反感。我把这看作是我身上精神的革命性，它可以产生对周围环境的各种反应。后来，在大学期间，在对社会现实的态度里，我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同时，我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已经很具体化了。我永远也不能成为某种“正统思想”的拥护者，我总是同“正统思想”进行斗争。我也从来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唯物主义者，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也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在社会问题上，我曾企图把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连我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也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式进行论证的，尽管我承认历史的唯物主义中的许多原理。相当一部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精神文化的低劣令我十分痛苦。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环境与我有亲近感。在我流放到北方的那几年里，我对这一点体验得特别强烈。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我永远也不能接受“极权的马克思主义”。青年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我经常和更加极权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我立刻就发现一个在今天也是十分现实的论题。在围绕纪德及其关于苏联的两本书而展开的争论中我也看到了这个论题。<sup>①</sup>我很愿意回忆我同青年时期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同事卢那察尔斯基的争论。但当他

---

<sup>①</sup>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这里指的两本书是《从苏联返回》（1936）和《对从苏联返回的修改》（1937）。——译者注

成为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后，我就不再同他争论了，并努力永远不再见他。在这些争论中，我是个严厉的辩手，我坚持真理和善是作为理想价值而存在的，不依赖于阶级斗争，不依赖于社会环境，即我不同意哲学和伦理学彻底地服从阶级的革命斗争。我相信真理和正义的存在，它们决定了我对待社会现实的革命态度，但它们不受社会现实所决定。卢那察尔斯基断定，如此保卫无私的真理，保卫理性和个性判断的权利的独立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使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服从革命的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也对我说，坚持我的独立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是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们同情共产主义的社会真理。纪德在谈论苏维埃俄罗斯时说出了自己所发现的真理，但人们否认他有这个权利，因为真理不能向个体的人显现，他不应该坚持自己的真理，因为真理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并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服务。于是，与最清楚的事实相关的真理，如果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有害，那么它将成为谎言，而谎言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必要的辩证因素。我曾一直以为，现在也这样以为，真理不为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服务，相反，一切都应该服务于真理。应该坚持真理，说真话，哪怕这样做对斗争是不合适和有害的。在现代世界里，人们在改变对待真理的态度方面走得太远了。有的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同样都断定，只有集体才知道真理，真理只在集体的斗争中显现。个人则不能知道真理，也不能坚持真理而反抗集体。还在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时代我就觉察到这一点的萌芽形式。于是，我就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维护人格主义，尽管我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要求是合理的。

接触易卜生和尼采的思想对那些年在我身上所发生的精神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在他们身上有另外意义上的动机在起作用，这些动机不同于和马克思、康德相关的动机。起初，对我而言，易卜生比尼采的意义还要大。即使是现在重读易卜生的戏剧，我依然无法抑制地激动不已。我的许多道德评价与易卜生接近，他把个性与集体尖锐地对立起来。此前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就看到了个性和个性命运问题的深度，我从童年时起就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里，以及在左派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情绪里我都没有发现对这个问题认识。我阅读尼采的著作时，他的思想在俄罗斯文化圈子里还未开始流行。尼采与我本性中的一极接近，与另一极接近的是托尔斯泰。甚至有这样一个时期，尼采战胜了我身上的托尔斯泰和马克思，但是这个胜利从来不是彻底的。尼采对价值的重估，对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厌恶，深深地进入我的精神斗争之中，仿佛成了暗中活动的力量。但是在真理问题上，我和尼采发生了冲突，和马克思亦然。不管怎么说，我的人格主义在不断地加强和尖锐化，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与这个人格主义相关。

心理反应在人的生活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很难在同一个时刻容纳完满，而且也没有能力把包含在他身上的那些原则归于和谐和完全统一，这些原则可能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对我而言，这总是意味着爱和自由的冲突，个性的独立性及其创造使命和社会过程的冲突，社会过程压制个性，把它当作手段。自由和爱的冲突，与自由和使命、自由和命运的冲突一样，是人生中最深刻的冲突之一。在生命的一开始，我就起来反抗贵族社会，并走向革命知识分子阵营，这时在我身上出现了对社会环境的第一次强烈反抗。但是，我痛苦地发现，在这个阵营里也没有对个性尊严的尊重，而且对人



民的解放经常与对人及其良心的奴役掺和在一起。我很早就看到这个解放过程的结果。革命者不爱精神自由，他们否定人的创造权利。第一次小规模革命<sup>①</sup>，曾经在我身上引发了内在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反抗。这个反抗不是针对政治和社会解放的因素，在这次革命中包含这些因素，而是针对这次革命的精神面貌，针对它给人带来的道德上的后果，我认为这些后果是丑陋的。我很熟悉当时的环境。我把批判左派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类型当作自己的任务。同时，和本来意义上的革命知识分子相比，我对左派极端知识分子的排斥更为强烈，我甚至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还保留着一定的个人联系。我在1907年写过一篇文章，在那里我预言了革命运动中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必然性。<sup>②</sup>在这些年里，对我的精神生活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传说的深入研究。甚至可以说，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接受了宗教大法官传说中的基督形象，我皈依了这个基督，而且在基督教自身里，我反对一切可以归结为宗教大法官精神的东西。在左派和右派里，在专横的宗教和国家里，在独断的革命社会主义里，我都看到了宗教大法官的这个精神。人的问题，自由问题，创造问题，都是我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创造的意义》一书是我的“狂飙突进”，我的独立的哲学世界观在其中获得了表达。还应该指出和雅·伯麦思想的接触对我所产生的意义，我从他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嫁接。其实，我位于当时存在的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的阵营之外。我觉得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与我内在地格格不入。当时我体验到的是对政界、文艺界和宗

<sup>①</sup> 指1905年在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译者注

<sup>②</sup> 此处指他的文章《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理简论》，载1907年10月27日《莫斯科周刊》，后被他收入自己的文集《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圣彼得堡，1910年；莫斯科，1998年）。——译者注